

奴才的“创造性”

奴才这个词,在清朝用得特别多。满人下级见上级,尤其是见皇帝,必定自称奴才。乾隆认为,清朝的臣,是奴才的奴才,无非是供役使的奔走之徒,跟大户人家看门、打杂、跟班伺候人的主儿,没有本质区别。按常理,这样的奴才谈不上创造性。

但在听话和顺从方面,清朝的奴才们还是有创意的。比如说,过去人们顺着皇帝说话的朝臣,有三旨相公(听旨、领旨、遵旨)、模棱相公,而清朝,则推陈出新,上了一个新境界。做过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红人的曹振镛曹大人,死的时候,被道光称为“实心任事”的朝廷第一号大学士,其做官的心诀,是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那个时候,很多后进的朝臣,在私下写笔记的时候,都免不了提及赏识提拔他们的老师前辈。最感恩的话,无非是说,老师如何叮嘱他们,上朝的时候,裤子上要缝上块皮子,最好装点棉花,否则跪久了,膝盖要生病的。当然,更有心的人,还会特意请教一些资深太监,讨教他们如何头磕得响,但又不十分痛的方法,以增进多磕头的边际效应。

深得曹振镛大人心法的,是位满人。此人叫全庆,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为官60年,活了82岁,最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可谓位极人臣,全福全寿。此老不仅见皇帝多磕头,而且回到家自己没事也

磕。风雨无阻,每日磕头120次,起来跪倒40次。就像打太极拳,做体操一样。据说,这就是此老的长寿秘诀。他的学生汉人翁同龢,在做官做到罢官回家之后,深感老师的功夫深厚,于是在家侍着,每天入夜必定在房间里三跪九叩数次,才上床睡觉。最终,得以保住了自家的首级,没有身首异处。

做奴才做得心服口服,自我总结经验,私相授受,然后再把磕头这种奴才仪式转变成健身体操。终于做到健长寿,这实在也算是一种创造。这样的创造,当然没办法让大清走出困境,更休谈富国强兵,但是在上面的皇帝或者太后,委实受用。无论说什么,都有人答应“喳”,无论做什么,都有人赞圣明,一呼百诺,威风凛凛。大权在握,图的不就是这个吗?可是,真到了有事的时候,这些奴才,除了馊主意之外,半点正经主意也没有,眼睁睁把皇帝太后带到沟里去。

所以,将下属都变成奴才,自我感觉是不错。但是不能碰上事,也不能有大事要办,否则吃瘪是现成的。只是,天下做领导的,更不打算做什么大事。只消大家向上一级一级地下跪,向下一一级地吆五喝六,天下太平。有事怎么办?再说吧。

(摘自新星出版社《不曾苟且》张鸣/文)

何为公民

什么是公民?我相信不少人难以回答。我们这代人,吃毒草、喝狼奶长大,成年后,再用公民教育解毒,却未必能解干净,口中的语言、脑中的思维,常见毒素的残余,毒质寒冷的磷光,仍能一击致命。我们只能默默安慰——或者说欺骗——自己,下一代的教育应该有所好转。

待我问侄子、侄女在小学的情况,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之丰、方法之富、器具之巧,的确远胜于我们贫乏的当年,不过,与我们一样悲哀的是,他们可以在十秒钟内算出“公民”的笔画,却依旧不知其中的内涵。何为公民?若依定义,“公民”可与“国民”通用。而今我们口中的公民,则另有所指,即与臣民相对——如此,便不能替换为国民,因为从名义上讲,臣民也属国民,纵然从实质上讲,独裁者没有内政,奴隶没有祖国。相比“国民”,“公民”身上的政治色彩更加浓重,有时甚至被做一个褒义词来指称,它的对立面,是臣民、愚民、暴民……

公民是权利与义务的结合体。不过在今日中国,我们说公民,更侧重其与权利的亲密关系(如“公民权”之说风行一时),这背后的原由不难想见,我们的国民,一向是义务太重而权利太轻,且权利往往滞留于纸面而无法落到实处。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型,必然从欠缺入手,更为重视权利的建构。这大抵可谓拨乱反正。对比可见:臣民毫无权利,愚民不知权利,暴民践踏权利,唯有公民,在实践并捍卫权利。

臣民的国度,呼唤英雄的拯救;公民的国度,只须普通人的耕耘。公民是凡夫俗子,不是英雄侠士。只可惜,在我们生存的年代,常常将公民误作英雄,这是我们的悲剧,更是公民的悲剧——这个时代太缺公民了,以至出现一个勇于维权的公民,不是被视为异端,就是被视为神话。须知,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公民意识的培植,借用一句流行语来讲:不是靠一帮勇敢的人,去触碰勇气的上限,而是靠一帮普通的人,来抬高勇气的下限。

教育不改革,中国还会第二次落后,会浪费掉现在的机会。我个人认为,教育改革很简单,就是引进竞争机制,允许私立学校办学;编写一些能够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教材。自己没编出来之前就翻译、有选择地引进。如果我们造鞋、造玩具的机器可以大批引进,为什么不能引进造人才的机制?

创意产业的问题就是建设中国品牌的问题,是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问题。

微博上一个网友发私信,问为什么中国没有能力做一个像样的服装品牌,只有服装制造和销售市场。我认为创意产业的特征是从想法开始,不是从资本开始,所以往往是从小到大,不像国企,各个都是大象的块头。可是在创意产

业上,中国中层干部犯了两个错误:一、喜欢规模,总得弄个大家伙。问题是大公司不需要政府帮助,他们交税就是了,比如我一个朋友的公司是纽交所的上市公司,却在中国国内年年享受创意产业优惠待遇,那就是用中国纳税人的钱补贴海外股民。而真正需要帮助的创产公司,连个流动资金贷款都拿不到。

有时候就是干等死。我要是当大官儿,就成立一个创意产业委员会,专门监督所有基层的创意产业鼓励政策,保证确实落实到企业上。

二、崇洋媚外,一说创意,海外的和尚真的好念经。前些日子,美国导演、商人卡梅隆在天津成立了公司,要把他那套拍3D的技术在中国市场兜售。你猜谁是第一个买主?居然是地方政府!斥巨资拍一个叫《皇城北京》的3D纪录宣传片。一个城市宣传片为什么要拍3D呢?戴着眼镜看《阿凡达》还有不少人,可是戴着眼镜看《皇城北京》就不多了。

最后说外宣,其实我真的不想管。但是有点看不下去。在纽约,要了解中国,外国人还是去当年胡适创办的中国学院和洛克菲勒的亚洲基金会,如果跟这两个机构共同策划些活动,效率会高得多。

(摘自《南都周刊》第42期洪晃/文)

那些拒绝进步的力量

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一种最深层的无力感,不是来自那种变化的多端,常常却是

一些拒绝改变的力量。它让我们一再反思,关于进步,关于法治,我们到底走了多远?

10月31日,一场声势浩大的公捕公判大会在山东曹县人民会堂举行,20人在大会上被公开逮捕,曹县法院随后对被告人进行宣判。根据当地官方的说法,2000余人参加了大会。这样的事情总是一再出现,早已到了令论者无语的地步。

禁止任何形式的游街示众,多年以来早已为法律三令五申。一个人永远对自己的身体拥有主权,即便罪人的身体也不能成为别人的手段。这些观点早已成为共识。然而就是这种我们以为早已成为社会共识的权利底线或权力伦理,以为属于最基本的政治精神、最浅显的文明规则,曹县方面却仍旧一副惘然不知,依然我行我素的样子,让人不知今夕何夕。已经很难说,相关部门到底是真不明白还是佯装不

这样的事例每出现一次,总会不可避免地让人调低对于法治社会的信心,对于依法执法的期待,而最终会让人误以为,法律与执行、法治与社会,从来都是两张皮。

(摘自《华商报》11.3 杨耕身/文)

一张传世照片是怎样“回”到中国的

我在外交部工作了34年,特别爱好摄影。在我看过的无数照片中,意大利著名摄影家焦尔焦·洛蒂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拍摄的这张传世之作,给我印象最深。当时,我一直想知道这张照片是怎么拍摄的,又是怎么流传的,经历过哪些有趣的故事,现在可以说,我的这些愿望全实现了。

照片记录了周恩来总理晚年典型瞬间

1973年,意大利《时代周刊》记者焦尔焦·洛蒂先生为总理拍摄的这张照片是一张半身像,整个画面为暖色调,在深深的背景中,总理穿着灰色的中山装,侧身背倚沙发,左臂扶在沙发上,右臂微微靠在胸前,消瘦的面容,双目深邃而坚毅地注视着前方。若干年后,在洛蒂先生再次访华时,邓颖超大姐当面对他说,“这是总理生平中最好的一张照片”。

撒了一个大谎终于拍成一张经典照片

据焦尔焦·洛蒂回忆:1973年1月6日,意大利外交部长朱塞佩·梅迪奇率团访华,作为《时代周刊》的摄影记者他也随团采访。一天,他得知当天晚上周总理要接见意大利代表团,便找到意大利驻华大使,执意要去人民大会堂。大使告诉他,“所有代表团的记者都不允许为周恩来照相,你去可以,但不能拍照,你答应我的这个要求,才能让你去。”洛蒂答应了大使要求,但出于职业习惯,还是带上了照相机并且老琢磨着与周总理拍照片。代表团成员和记者们三四十人排着队,逐一与周总理握手。为了拍照,洛蒂特意排到了队尾。轮到他了,他谦恭地用法语对总理说:“尊敬的总理阁下,我来时撒了个大谎,答应不给您拍照,可是我觉得我很难见到您,不能不给您拍照,因此,请您允许。”周总理微微地点头认可。洛蒂马



次按下了快门。

偷梁换柱骗警卫“没收”假胶卷

洛蒂拍完照片后就一直在想:怎么做才能把底片保留下呢?突然,他眼睛一亮,快速地把相机放在桌子底下,取出底片,又迅速装上一卷新胶卷,并按了两下快门。不一会儿,一个警卫人员来到他面前,很有礼貌地问他:“您是洛蒂先生吗?”洛蒂答:“是。”警卫对他说:“您给周总理拍了照片,违反了我们有关规定,请您立刻把底片交出来。”洛蒂演戏似的向警卫人员“苦苦哀求”,然后假装“很不情愿”地当着警卫人员的面把相机打开,把胶卷从相机中取出曝光后,“十分沮丧”地交给了对方。

照片被王传斌参赞藏在箱子里带回国

周总理这张传世之作是由我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参赞王传斌带回的。在王老生前写就的《跨世纪的回忆》中,详细地谈到了这张照片从意大利带回国内的来龙去脉。书里说,这张照片冲洗出来后,意大利《时代周刊》格外重视,将其刊登于该杂志封面,其他报刊多予转载。1974年

冬,原驻意大利商务参赞高竹峰同志任满奉调回国,临行前的一个夜晚,来到王传斌同志房间,从怀中取出一件用白纸包裹着的物品,小心翼翼地打开。王老一看惊喜非常,原来是一张10英寸的周总理照片。高参赞对他说:“这是一位意大利记者从中国回来后赠送给我的纪念品。我和你在这里一起工作和生活了好几年,在即将分手之际,我把它给你留下,让我们共同分享对周总理的尊敬和热爱吧!”王老欣然接受了这份“宝物”,并允诺一定设法将其带回。

王老在回忆录中说,“1975年初,我回国休假,采取了妥善的方法,以保证顺利通过海关。我把硬壳帆布箱的里面擦洗干净,铺上整洁的白纸,将总理的照片平铺在上面,再用洁净的白纸盖好,以免与其他衣物接触弄脏照片。一切就绪后,我比较放心了,但内心还是在默念:总理啊!叫您老人家暂时受委屈了!到达北京海关时,海关人员照例地问:箱子内有无违禁物品?有无为他人捎带的物品?我说:我们在外奉公守法,从未买过什么违禁品,只是用自己的工资购买些生活必需品,按照规定不会为他人捎带什么物品。就这样得以顺利过关。回到家中赶快开箱取出衣物,看到周总理的照片很平整,无任何褶皱,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一致同意将照片装在镜框里挂起来。打倒‘四人帮’以后,我老战友的孩子李尚志到家里来,看到这张周总理的照片非常惊喜,那时他是新华社国内部的负责人,回去后将周总理照片的事报告给了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曾涛同志,他随即决定请李尚志到我家中取走照片,翻拍后制版印刷。从此,这张周总理的照片很快传到全国,出现在各地的书店里,悬挂在各家户户,各种报刊杂志也予以刊登。”

(摘自《北京晚报》10.29 关宗山/文)

那

“打倒老三”

标语从来都是在广大农村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最常见的方法。那年有一个标语赫然醒目:“打倒老三!”我就是老三。所以,生产队不给我上户口,分粮食。

奶奶还经常一个人跑到生产队的打粮场偷偷抹泪,埋怨老天为啥这么对她?为啥就不给她个孙子呢?襁褓中的我,也许已经知道家里人不欢迎自己,没过几天,我就生病了。

奶奶的善良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家里就剩下一口干粮也要打发的;谁家有矛盾了,奶奶就去帮人家调解。我一生病,奶奶慌了,赶紧求神保佑。

神告诉她:“你们都嫌她是丫头,那就降灾给她,把她收回去。”这下,奶奶吓坏了,哪舍得让我生病呢?奶奶就对神说:“我们不嫌弃她。”

丫头,就算有一群丫头我们也不会嫌弃的。”所以,奶奶对神的保证真成了现实。在我身后,妈妈又生了三个丫头,四妹、五妹和六妹。

(摘自《当我从天安门前走过》徐庆群/著)

“文革”“遗技”



“文革”“遗技”

派他到县医院去偷单子。二强的同学已

办好了证明,让他去借来一用。

一切准备齐全,三个人接下来要做的

事,就是选病。那时我们每个知青户

都有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几个人翻了

半晌,各自选了一个。二强选的是腰椎

间盘突出,大字文气点,选的也不一

般,叫房性心颤。黄毛开始选的是痔疮,

众人嫌恶心,给骂了回去,又改成了风

湿性关节炎。然后从书上列的症状里挑上

几条,由大宇仿着医生们惯用的龙飞凤舞的笔

道往表上填。在蜡纸上刻那枚章,花了大宇

几乎一天的时间,毕竟三年没刻,手硬的不行,

前两个都刻坏了,到第三个才找到了感觉,

终于成功。三张证明制作完毕,大宇把那张蜡

纸,一把火烧了。

可能是天意怜幽草吧,他们一路过关斩将,

竟把事儿顺利地办成了。我想管事的人心

里也清楚,那么多的知青办病退,有几个是真

的,何必那么较真。这假证明未必做得天衣无

缝,还是人家手下留情,想积德罢了。

我们队剩下的几个知青都是文人,那些个

手段是使不出来的,但现成的手艺,为何不用

那病退证明不就是一张纸吗,都是印好的现

成格式,咱到医院里去顺几张就行。至于病历,

照着别人的抄,什么肝炎肺炎心律不齐,血压高

关节炎,什么管用咱填什么,关键就是那枚章

子,只要盖上它,狗爪子划上的印儿都算数。

说起模仿图章,那是我们在刻印小报时发

明的一项副产品,在“文革”中用过多次。那时

很多组织都有宣传队,经常搞什么演出。门票

多是油印的,盖上章子就发行。我们如果没票

就仿制,找一张真票,放在蜡纸下边,量好尺

寸,开始仿刻。票面仿制并不难,无非就是几

行字,图章得费点劲儿,把它照原样描下来,然

后像刻宣传画那样一点点地刻,刻好了,取一

团棉花,蘸上红印油,把蜡纸覆在票上,轻轻一

擦,一枚逼真的章样就印上去了。

队里这时只剩下了三个知青,大宇他爸是右

派,自然上学招工都没他的份儿。黄毛他妈在

街道作坊糊纸盒,二强家也是无权无势。

三人走投无路,就想起了“文革”时我们玩过的这点

技巧。假造病退证明不是小事。闹不好甭说北

京回不成,还有可能被抓起来。三个人击掌为誓,要守口如瓶,绝对不能让第四个个人知道。然